

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

张文霞 赵延东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摘要: 本报告基于一项在北京市居民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全面描述了当前北京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情况。结果表明:目前公众风险感知最为强烈的是“假冒食品”的风险,公众对“假冒食品”和“食品变质过期”的风险知识掌握程度好于对“农药残留”和“添加剂”的掌握程度;北京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风险危害性和发生可能性的定位均很高,约三分之一的市民对当前食品安全的现状感到不满,并认为主要问题出在管理力度不够上。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北京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中,风险的感知和实际分配已经表现出与传统社会分层不尽相同的规律,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

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风险感知, 北京公众, 风险社会

一、“公众食品安全感知调查”的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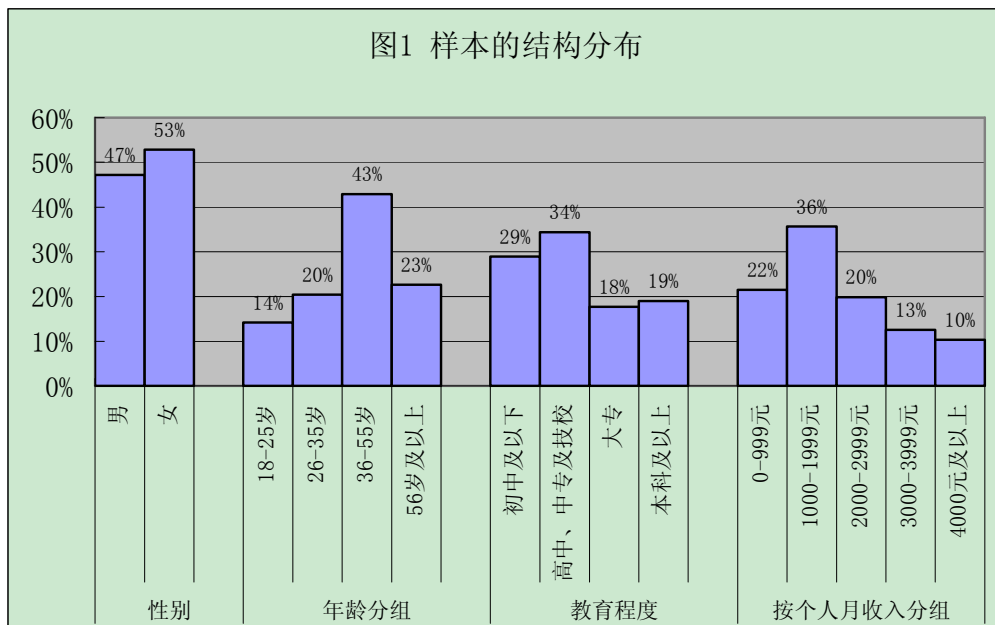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公众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和重视。2007年8月,我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就中国食品生产和质量状况、食品监管体制和监管工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技术保障体系以及食品安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做了全面详细的说明。由于食品安全问题贯穿于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涉及从生产加工到运输交易的各个环节,包含着难以计数的风险来源与危害物,因此在任何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控制和管理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它不仅涉及到政策、管理、科学、技术、媒体等多个方面,而且涉及公众的认识、态度倾向和心理预期。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调查研究,但以公众对食品风险的主观感知为出发点的研究尚不多见。为深入了解中国公众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看法和主观感受,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先后于2007年的7月和9月分别在湖南省湘潭市和北京市,采

* 本研究得到科技部委托项目“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资助,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得到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协助,特此致谢。

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入户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了“公众食品安全感知调查”。本文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资料写成，集中反映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状况。

在北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北京市的城镇常住居民。我们先在北京市城八区的 2018 个社区中随机抽取 50 个社区，然后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住户 50 家，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 kish 表随机抽取一人作为调查对象。实际获得有效问卷 9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46%^①。调查样本的基本结构见图 1 所示。



二、本研究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假设

1、风险感知的有关定义及观点

“风险”在近二十年来已经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术语。一般认为，“风险”是指一种不希望出现的事件的危险，它常常联系着一种可能性，即一种人们不希望出现的现实（负面后果）可能会作为自然过程或人类活动的后果而发生^②。在传统社会，自然风险如洪水、地震等是主要的风险源，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导致的风险上升为人们面临的主要危险。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随着现代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使人类

^① 城八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朝阳区、崇文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另外在计算回收率时，从总样本中去除了 364 户住址信息有误的住户。

^② 雷恩·罗尔曼，《跨文化的风险感知》，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

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③。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决策者和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已经不得不面临风险社会的许多挑战。

现代风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建构性”，也就是说，不存在一种纯粹“客观”的风险，人们对风险的主观感知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塑形”着现代风险。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探索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及其影响，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风险感知”（perception of risk）指的是人们对于正在或可能影响他们的某种风险的根源及后果的意见和态度。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风险感知包括风险估计和风险评估的所有方面，它包括了人们对风险的危害性大小、发生规模、发生概率、收益、出现危害性后果的时间延迟性、可接受程度等维度的判断^④。将人们对这些风险维度的判断综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对风险的总体感知，它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和判断，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心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未来的行为倾向。按照风险社会的理论观点，相对于物理后果而言，风险的社会—心理后果对于人们的行为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人们的风险感知无论是对于理解人们的风险行为，还是对于决策者制订有关风险政策都有着特殊的意义^⑤。

正如风险研究的心理测量范式所认为的那样，风险是由受到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个人来主观定义的^⑥，它与人们的年龄、学识、经历和经验、习惯、经济社会地位、性格和信仰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本部分，我们将集中讨论北京公众对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状况以及影响风险感知的各种社会和个人因素，并试图透过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来理解中国社会的风险问题。

2、食品安全风险的分类与风险感知的维度

在前面介绍风险感知概念时我们已经说明：风险感知包含了多种维度，要想具体了解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情况，我们有必要从各种维度出发来观察人们的风险感知。现有研究中对风险感知的主要研究维度包括：风险水平、危险的定性特征、收益、可接受性等方面，其中核心变量是（感知到的）风险大小及风险接受程度，危险的定性特征主要包括：可怕（忧虑）程度、熟悉/不熟悉、（后果）是可观察的/不可观察的、可控制/不可控制、立即产生/延缓发生、暂时的/长期的、科学上是已知的/未知的，等等。^⑦综合以往研究成果，我们在研究中将 从 5 个方面的 8 个维度来考察公众的风险感知：（1）风险事件可能后果的严重性（包

^③ 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雷恩、罗尔曼，《跨文化的风险感知》，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

^⑥ 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

^⑦ 雷恩、罗尔曼，《跨文化的风险感知》，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谢晓非、徐联仓，“一般社会情境中风险认知的实验研究”，《心理科学》，1998，21:315-318。

括对个人的影响和社会后果); (2) 风险的可能危害性后果显现出来所需时间长短; (3) 公众对风险的情绪反应(感到“可怕”和“担忧”); (4) 公众对认识和解决食品安全的信心——包括对食品安全风险在科学上是否已被充分认识以及社会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信心; (5) 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和收益之后个人对风险的可接受性。

“食品安全”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包含了食品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中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物的有关规定,食品危害可分为微生物危害、农药和杀虫剂的残留、食品添加剂滥用、化学危害(包括生物毒素)、假冒食品等五类^⑥。本研究参考这种分类,把食品风险分为“食品变质过期”^⑦、“假冒食品”、“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和“食品中的添加剂”四大类。其中,食品变质过期所蕴涵的风险主要是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污染和化学污染(如霉变),这些污染往往导致食源性疾病。食品中农药残留和添加剂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农药和添加剂的滥用,它更多的是一种化学性污染和化学危害。假冒食品问题虽然更多的是管理问题而非食品安全问题,但由于假冒食品往往与伪劣联系起来而导致健康问题,我们也把它作为食品安全中的重要风险之一,但其蕴涵的风险类型比较复杂,其风险来源不但可能来自加工过程,而且可能来自原材料,所以既可能含有微生物危害风险,也包含着较大的化学危害风险,甚至包含物理性的风险。从历史发展来看,食品变质过期和假冒食品自农业社会以来就一直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农药残留、添加剂等风险则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下面,我们将按风险的不同维度来具体分析公众在这四类食品风险上的感知情况。

三、北京公众对不同类型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状况比较

(1) 公众对四大类食品安全风险后果的感知都很强烈,显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公众严重缺乏安全感,食品安全风险对公众的威胁特别是心理上的威胁十分显著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公众对风险后果严重性的感知:一是被访者对风险给自己及家人带来(潜在)影响的判断,它是个人实际感受到的风险,其程度高低往往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暴露于风险中有关;第二个方面是被访者关于风险对整个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后果的判断。对于个人而言,前者往往更具有现实的根据,但同时也表现出更为主观的特征,它表达着个人对风险事件具体而真实的感受;后者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这两个指标在理

^⑥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强化国家食品控制体系指南》,200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加工研究所等编印(内部资料)。

^⑦ 严格来说,食品变质与食品过期是两个概念。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公众,往往没有科学的办法来严格区分食品的过期与变质。我们认为这正体现了风险的特征——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把两者混淆在一起,作为一个类型。

论上具有某种相关性，但具体到不同的个体，其间的联系可能并不相同。

从表 1 的 A、B 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看，公众对四种食品安全风险的实际影响以及社会后果严重性方面的判断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假冒食品”对被访者个人和对社会的影响均被认为是最大的，“农药残留”的个人和社会影响次之，其后是“变质过期”和“添加剂”。四类风险的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得分都在 4 分以上，而且“假冒食品”、“农药残留”和“变质过期”风险的后果严重程度均接近或超过 4.5 分，平均值接近“影响（后果）非常大”的程度。这一结果说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对公众的影响（特别是心理影响）已经十分明显，尤其是假冒食品和农药残留问题所造成的危害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些问题应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充分重视。

表 1 公众对不同类型食品风险各维度的感知情况

问 题	变质过期	假冒食品	农药残留	添加剂
A. ……对本人和家人健康的实际影响 (1=基本没影响, 5=影响非常大)	4.48 (0.98)	4.62 (0.84)	4.54 (0.82)	4.06 (0.96)
B. ……对整个社会的后果 (1=轻微后果, 5=灾难性后果)	4.48 (0.81)	4.65 (0.65)	4.58 (0.70)	4.04 (0.98)
C. ……后果出现的时间长短 (1=马上出现, 5=过很久出现)	2.24 (1.48)	2.65 (1.31)	3.32 (1.15)	3.71 (0.97)
D. 感觉……的可怕程度 (1=根本不可怕, 5=很可怕)	4.77 (0.57)	4.80 (0.53)	4.80 (0.48)	4.34 (0.91)
E. 对……的担忧程度 (1=完全无所谓, 5=非常担忧)	4.80 (0.51)	4.82 (0.49)	4.81 (0.48)	4.38 (0.86)
F. 科学知识对……危害的认识程度 (1=完全没有认识, 5=完全认识)	4.62 (0.66)	4.52 (0.77)	4.44 (0.76)	3.95 (0.99)
G. 社会对……危害的控制程度 (1=完全不可控制, 5=完全可控制)	4.25 (1.03)	3.73 (1.41)	3.56 (1.32)	3.59 (1.31)
H. 本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 (1=完全不能接受, 5=完全可接受)	1.33 (0.88)	1.31 (0.83)	1.59 (0.98)	2.08 (1.10)

注：表中数字为基于 5 级量表的平均得分，括号内为标准差。

(2) 公众认为四大类食品安全风险的可能后果出现的时间差异较大，“变质过期”的危害性后果出现时间最短，而“农药残留”和“添加剂”的危害显现所需时间相对较长

对风险事件的可能后果出现所需时间的判断，反映了公众认为风险是一种即将发生的危险和还是隐藏的、长远的危险。本研究发现，在风险可能的不良后果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上，公众对四类风险的判断差异比较大(参见表 1 中 C 项的分数)。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公众认为食品“变质过期”的危害后果出现最快，其次是“假冒食品”，“农药残留”

和“添加剂”的后果显现所需时间最长。可见在公众看来，农药残留和添加剂的后果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和延时性，不是马上可以发现的。

(3) 公众对四大类食品安全风险的忧惧程度均较高，假冒食品尤其让公众担心害怕

在对风险的情绪反应上，认为风险是否可怕和是否担忧风险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不同的维度，与担忧相比，对风险可怕程度的判断反映的是一种更为相对客观的社会事实判断；而担忧程度更为主观，更能反映出个体对风险的实际焦虑水平。从表 1 中 D 和 E 项的数据看，公众对于四类风险均表现出较高的恐惧和担忧情绪，除对“添加剂”的忧惧程度分在 4.3 分左右外，其余三项的担忧和害怕程度分均在 4.8 分左右，很接近“非常可怕”和“非常担忧”的程度。此外，公众对四类风险的忧惧程度排序也很一致，从高到低依次为“假冒食品”、“农药残留”、“变质过期”、“添加剂”。数据分析也表明，可怕程度与担忧程度高度相关，显示在风险感知方面，这两种情绪具有某种同一性。

(4) 公众对于科学技术认识食品风险的能力和社会解决食品风险的能力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对科学认识风险的能力与社会控制风险的能力的判断，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指标：社会控制风险的能力很大部分是建基于科学认识之上的，但科学上的充分认识并不必然带来风险的实际控制，社会对风险的控制能力除了依赖于科学知识外，还与社会的管理能力、管理体制、社会环境等有很大关系。表 1 中 F 和 G 项的结果分别反映了公众对当前科学能否充分认识食品安全问题的各类风险和社会有无能力最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看法。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科学知识认识食品风险的能力给予了很高的信赖，特别是在科学对“变质过期”、“假冒食品”和“农药残留”的危害性的认识问题上，公众的给分均在 4.5 分左右，比较接近于“完全认识”的分值；在“添加剂”的认识上，公众对科学的信心略低，不到 4 分。相对于对科学认识风险的高度信心，公众对于社会控制食品风险能力的信心要稍弱一些，除了对解决“变质过期”的能力平均分在 4 分以上外，其它三项的打分都在 4 分以下，但总体上还是接近于“比较有信心”的程度。总体看来，公众对认识和解决“变质过期”问题的信心较高，“假冒食品”和“农药残留”次之，而对认识和解决“添加剂”的信心最弱。

(5) 公众对四类食品安全风险表现出较低的可接受性，但对于“添加剂”和“农药残留”等风险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接受度

对风险的可接受性是风险感知研究的重点之一，一般假设人们对风险的接受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风险的可接受程度是其成本和收益比的函数。但许多研究表明事实并不这么简

单，一些定性特征，如风险是否自愿等都影响着人们对风险的接受程度。^⑩从表 1 的 H 项数据来看，公众对四种食品安全风险的个人接受程度很低，变质过期、假冒食品的可接受分数低于 1.5 分，近乎“完全不能接受”，其中又以“假冒食品”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为最低。“添加剂”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相对稍高，平均分在 2 分以上。总的看来，北京公众对于添加剂和农药残留等由技术发展导致的现代风险宽容度更高，与之相对应的，如假冒食品和变质过期食品这些从管理上说理应更容易控制的风险则很难为公众所接受。

(6) 总体来看，公众对“假冒食品”的风险感知最为强烈，社会经济结构、个人背景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弱

总结以上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各维度的感知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对“假冒食品”的总体风险感知最为强烈：它的后果严重性和忧惧程度都排在各类风险之首，同时其可接受性也是最低的。政府在制订相关政策时，应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在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的倾斜重点上做出相应调整。

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哪些社会和个人因素与食品风险感知之间存在关联。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分别将以上 8 个维度中四类风险感知的得分加总，即得到这个维度上的食品风险感知总分，然后对风险的不同维度指标与个人背景变量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了不同风险感知维度的影响因素有一些差别。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中不再具体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而直接综述如下：

在实际影响维度上，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表现出显著差异，按收入五等分分组后发现：收入最低组和最高组感觉食品风险对自己影响最大，而中等收入组则认为影响较小。但有趣的是，按消费水平分组所得结论却不太一样，“贫困”组仍是自认为受食品风险影响最大的，而中等的“小康”组也认为自己受影响很大。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状况最差的群体感受食品风险的实际影响最大，但中间阶层和高层对食品风险实际影响的感知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从食品风险的社会后果看，年龄和婚姻状况是最明显的影响因素。年龄较大者和已婚者更可能认为风险的社会后果严重。这或许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可能从社会整体出发，对食品安全的社会后果更为担忧。而已婚者认为社会后果更严重的结果很可能与年龄差异有关。

可怕程度的影响因素较多，中年人比起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认为食品安全风险更可怕，已婚者比未婚者认为食品风险更可怕，这可能与中年人和已婚者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⑩ 克里姆斯基、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有关。不同收入的人在风险的可怕程度感知上存在明显差异，相比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组来，处于中等收入的三组（中低、中、中高组）觉得食品风险更为可怕。这一结果与前面有关收入与风险影响感知的相关结果对照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收入处于两极的人们感觉食品风险对自己影响最明显，但并不觉得这类风险很可怕；而收入处于中层的人们尽管认为食品安全对自己的影响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却又认为食品安全比较可怕。

在食品风险的社会可控性问题上，只有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表现出显著的感知差异。这种差异也是一种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曲线。教育程度最低和最高的两个群体（“初中及以下”和“大学以上”）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可以控制食品风险的危害，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程度者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处于中等教育程度的人们则对此信心更低。

除了以上提到的维度外，不同社会群体在其他食品风险维度上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即使是上述有显著差异的因素，相关系数也都比较低。

四、北京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总体定位

除了对不同种类食品安全风险的具体感知的比较，我们还想了解在公众心目中，食品安全问题的总体风险相较其他自然和社会风险的相对定位究竟如何。在调查中，我们要求被访者用5级量表的赋值方法（1分为很低，5分为很高）为给定的15种风险事件的危害性和发生可能性打分。调查结果发现：

（1）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和发生概率的看法均集中在高端，特别是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危害性的看法高度一致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表2的数据显示，近80%的公众为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危害性打了最高分5分（代表危害非常大），近17%的公众打了4分，两者合计超过96%。也就是说北京公众近乎一致地认为食品安全事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很大或比较大。

表2 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危害性和近期发生可能性的看法 （单位：%）

问 题	打 分					合 计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您觉得“食品安全事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大小如何？	0.0	0.2	3.5	16.9	79.4	100.0
您觉得“食品安全事件”在本市近期有可能发生吗？	2.4	12.2	18.2	32.7	34.4	100.0

注：表中的1、2、3、4、5代表5级量表的得分，对于社会危害程度，1分代表“基本没危害”，5分代表“危害非常大”；对于近期发生的可能性，1分代表“基本不会发生”，5分代表“很可能会发生”。

关于食品安全事件近期在当地发生的可能性，有近 35% 的人打了 5 分（代表可能性非常大），近 33% 的人选择了 4 分。这些数据说明，三分之二以上的公众认为食品安全事件近期在北京有可能发生，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仅占 14.6%。对不同人群的进一步统计分析表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公众看法的影响均不显著。换句话说，当前北京公众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以及近期发生概率的看法呈现出高度一致。

（2）在调查列出的 15 种风险中，“食品安全”无论是在危害性还是发生可能性上都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显示食品安全问题在公众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根据公众对 15 种风险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和发生可能性的打分情况（见表 3），我们发现，公众对列出的 15 种风险的社会危害性的评分均值都在 4.4 分以上，接近于“危害很大”的范畴，并且各类风险在社会危害性方面的得分彼此很相近。其中，“核泄漏”、“不明传染病”、“地震”、“恐怖袭击”等具有重大集中伤亡可能的事件在社会危害程度方面被置于非常突出的位置，并且意见相对集中（标准差均相对较低）。有趣的是，尽管公众认为这些风险的危害极大，但对于它们发生的概率却做出了相对较低的判断，基本倾向于认为这些风险在北京的发生可能性很小（判断分数均在 3 分以下）。15 种风险在发生概率方面的得分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基本模式是：认为危害程度相对较高的事件，发生概率相对较低。

表 3 不同风险事件的社会危害程度和近期发生可能性大小的排序

社会危害程度大小				近期发生可能性大小			
排	序	均值	标准差	排	序	均值	标准差
1	核泄漏	4.93	0.35	1	房价持续上涨	4.42	0.81
2	不明传染病	4.89	0.38	2	贫富差距加大	4.35	0.83
3	地震	4.89	0.45	3	交通事故	4.33	0.85
4	环境污染	4.83	0.44	4	环境污染	4.03	1.10
5	恐怖袭击	4.79	0.55	5	<u>食品安全事件</u>	<u>3.85</u>	<u>1.10</u>
6	<u>食品安全事件</u>	<u>4.75</u>	<u>0.52</u>	6	看病越来越难	3.69	1.33
7	社会动乱	4.72	0.60	7	生产安全事故	3.62	1.04
8	交通事故	4.7	0.61	8	恶性犯罪	3.00	1.17
9	恶性犯罪	4.69	0.63	9	能源短缺	2.93	1.35
10	能源短缺	4.65	0.62	10	经济动荡	2.89	1.20
11	经济动荡	4.65	0.63	11	不明传染病	2.64	1.32
12	生产安全事故	4.63	0.62	12	社会动乱	2.31	1.29
13	房价持续上涨	4.47	0.80	13	恐怖袭击	1.99	1.22
14	看病越来越难	4.45	0.85	14	地震	1.56	0.83
15	贫富差距加大	4.45	0.87	15	核泄漏	1.49	0.88

注：表中“均值”栏数字为 5 级量表平均得分。对于社会危害程度，1 分代表“基本没危害”，5 分代表“危害非常

大”；对于近期发生的可能性，1分代表“基本不会发生”，5分代表“很可能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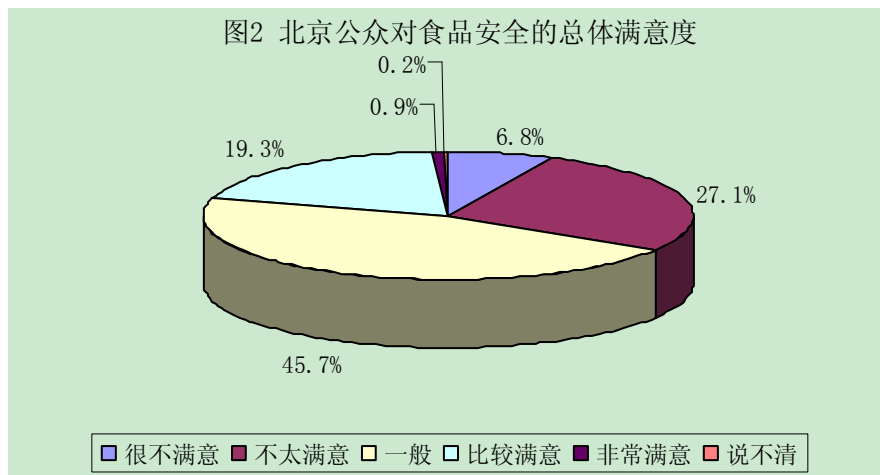
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危害性的评价平均为 4.75 分；而对其发生可能性的打分平均为 3.85 分。从表 3 的排列顺序看，食品安全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性在 15 种风险中位列第 6，排在“核泄漏”、“不明传染病”、“地震”、“环境污染”和“恐怖袭击”之后；其近期发生的可能性位列第 5，排在“房价持续上涨”¹¹、“贫富差距加大”、“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之后。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在公众心目中，“食品安全事件”和“环境污染”的危害程度和发生概率都处于十分靠前的位置。根据传统的风险分析观点，风险的大小等于后果严重性与其发生概率的乘积。从这个角度看，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公众心目中最重要风险之一。这显示出人们对直接关系到自身健康、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同时又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选择性（不管是否自愿都不可拒绝或不可完全拒绝）的风险事件，会有更强烈的感知。

五、北京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的总体满意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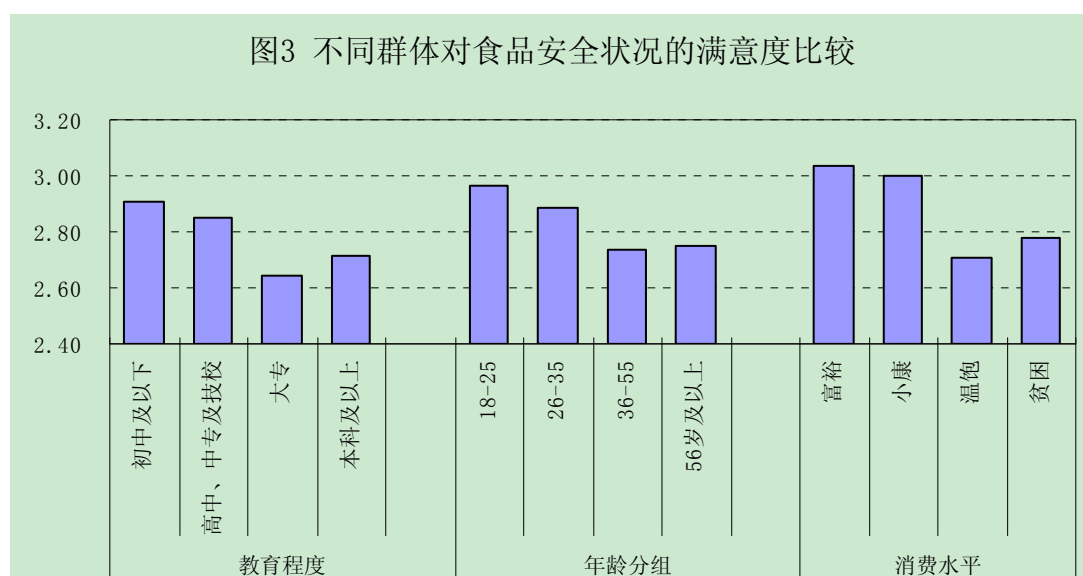
（1）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满意度不高，约三分之一明确表示不满意

调查中以一个 5 级量表（1 分代表很不满意，5 分代表非常满意）测算了北京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的总体满意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度平均分为 2.80，倾向于不满意一端。具体说来（见图 1），有 0.9% 的公众表示非常满意，19.3% 的公众表示比较满意，表示一般满意的公众占 45.8%；而明确表示“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分别占 6.8% 和 27.1%，两者合计约为 34%。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一的公众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感到不满。



¹¹ 由于这是 2007 年的调查数据，房价上涨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到 2009 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消费水平的公众在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满意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在统计上均达到 0.05 显著度），结果如图 3 所示：



注：分数越高表示越满意，1 代表很不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

年龄差异。 调查发现年龄对于满意度有较明显的影响，25 岁以下组满意度平均分最高，为 2.96 分；在 26-35 岁组、36-55 岁组和 55 岁以上组中，满意度平均分逐次下降，分别为 2.89、2.74 和 2.75 分。总的趋势是年龄越大，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满意程度越低。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年龄越高的人对食品安全的信息更为关注，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会变得更加关注，因此他们对现状也更不易满足。

教育差异。 总的趋势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程度逐渐下降。从不同教育分组的满意度平均分看，初中及以下组的平均满意分为 2.91 分，高中组降至 2.85 分，大专组最低，为 2.64 分，大学以上组也相对较低，平均满意分为 2.71。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知识的增多，人们的安全意识增强，对食品安全的期待也变得更高；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个人有能力从更多的途径获取信息，因而对于现状也更倾向于不满意。

消费水平差异。 按照国际通用的恩格尔系数方法对家庭经济消费水平进行分层以后¹²，发现不同消费分层的家庭在满意度方面差异比较显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温饱”水平

¹²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分组标准稍作细化，分组标准为：恩格尔系数在 0.6 及以上定为“贫困”组，0.5-0.59 为“温饱”组，0.4-0.49 为“小康”组，0.3-0.39 为“富裕”组，0.3 以下为“最富裕”组。由于本研究中“最富裕”组个案过少，因此将其与“富裕组”合并为一组。

的家庭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最低（平均 2.71 分），富裕家庭和最富裕家庭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其中富裕家庭满意度平均分最高，为 3.04 分，而“贫困”和“小康”家庭的平均满意度居于中游（分别为 2.78 和 3.00 分）。可见经济消费水平与满意度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最贫困的家庭并非对食品安全现状最不满的群体，处于温饱阶段的家庭反而对安全最为不满。这可能是由于后者一方面缺乏保证食品安全的资源，另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意识上又比最贫困阶层有所提高，这种矛盾使得他们更容易对现状不满的缘故¹³。

（2）大多数公众认为当前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管理力度不够

近年来，食品安全管理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管理的难点之一。那么在公众看来，当前食品安全管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从调查结果看，有 10.9% 的公众认为主要问题是“现行安全标准和法规不够严格”，40.5% 的公众认为问题不在标准和法规，而在于“管理跟不上”，另外将近一半（48.6%）的公众认为以上两个方面都有很大问题。把这些数字综合起来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公众（近 90%）认为当前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管理力度不足有关，更有四成公众认为管理力度不足是当前食品安全管理的最主要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管理中存在问题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

这一结果说明，公众普遍希望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问题上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实施更有力的措施打击各种不法行为，切实保障居民的食品安。鉴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应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加强食品安全研究和检测、促进食品研究科技工作者与公众沟通，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要任务，并考虑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食品安全问题研究和检测结果与公众及时沟通的机制。

六、小结与讨论

本文从风险感知的角度比较粗浅地考察了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与态度。结果表明，食品风险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公众话题，公众在食品问题上严重缺乏安全感，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忧惧程度较高，尤其是假冒食品让绝大多数公众感到担心害怕；社会经济结构、个人背景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弱。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表现出较低的可接受性，对食品管理状况不甚满意，并且认为主要问题出在管理力度不够；但对于科学技术认识食品风险的能力以及社会解决食品风险的能力尚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¹³ 从不同消费水平组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关注程度差异看，“温饱组”确实是关注程度最高的，尽管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减缓公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忧惧情绪，显然已成为政府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风险分配的逻辑已经取代了财富分配的逻辑”，风险的感知和实际分配表现出与传统社会分层不尽相同的规律，“贫困是分等级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¹⁴。而我们的调查结果似乎喻示着，至少在北京这样现代化的大都市中，风险及其感知的分配逻辑与传统的社会分层逻辑（如财富分配的逻辑）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一致现象，风险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分层标准。从这个角度看，北京似乎已经具备了“风险社会”的某些特征。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在中国，风险分配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这一调查显然还无法回答，它需要更多、更深层次的个案研究和更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的支撑，更需要开展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它能引起学术界、政策决策者们和公众对中国社会风险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和深入探讨。

¹⁴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